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库

MA KE SI ZHU YI LI LUN YAN JIU WEN KU

NONG HU JING JI XING WEI YU NONG CUN SHE HUI
ZHI LI YAN JIU

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社会 治理研究

饶旭鹏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库

MA KE SI ZHU YI LI LUN YAN JIU WEN KU

本书受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库”出版计划、兰州理工大学“红柳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资助出版

NONG HU JING JI XING WEI YU NONG CUN SHE HUI
ZHI LI YAN JIU

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社会 治理研究

饶旭鹏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社会治理研究 / 饶旭鹏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194-0067-5

I. ①农… II. ①饶… III. ①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国②农村—社会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F325.14
②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326号

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社会治理研究

著 者: 饶旭鹏 著

责任编辑: 李壬杰

责任校对: 邓永飞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17249(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19571(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Lirenjie111@126.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02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0067-5

定 价: 38.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 任：李贵富

副主任：夏天东 丁虎生

委 员：张军成 饶旭鹏 杨 莉 叶 进 张铁军

王海霞 苟颖萍 戴春勤 洪 涛 王国斌

马云霞 李积伟

目 录

第一章 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二元结构	1
第一节 农户经济生产的二元结构	1
一、土地地位的改变	2
二、劳动力的非农化配置	4
三、农业技术革新动力不足	8
四、农户家庭二元生产格局的形成	9
第二节 农户家庭二元消费格局的形成	12
一、安全逻辑：农户日常消费的逻辑	12
二、宣示逻辑：农户居住与重大社会仪式消费的逻辑	14
三、农户经济消费二元逻辑的形成	18
第三节 农户经济行为双重二元结构的形成	21
一、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二元结构的形成	21
二、农户经济行为双重二元结构的发展趋势	26
第二章 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概述	28
第一节 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28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29
二、社会治理的理论回顾	30
三、农村社会治理的科学化	33
第二节 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	36
一、系统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关系	36

二、依法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根本依据	38
三、综合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规制系统	38
四、源头治理：农村社会治理的标本关系	39
第三节 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	40
一、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	40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	43
第三章 农户经济行为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48
第一节 经济过疏化	48
一、经济过疏化发生的原因	49
二、经济过疏化的表现	51
三、经济过疏化的影响	55
第二节 政治个体化	58
一、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体制	58
二、“村民自治”的个体化困境	60
三、政治个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63
第三节 文化多元化	65
一、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基本特征	66
二、多元并存的新乡村文化	69
三、乡村多元文化的影响	71
第四章 农村社会治理的理念更新	73
第一节 民生为本	73
一、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	74
二、树立科学的农村文化民生建设理念	77
三、社会政策要兜底	79
第二节 城乡一体	83
一、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84
二、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87
三、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90

第三节 协调发展.....	93
一、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93
二、促进新型“四化”同步发展.....	96
三、推动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协调发展.....	99
第五章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农村社会治理.....	102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因.....	102
一、实践结构论：政府职能转变的分析框架.....	103
二、全球现代性的成长：政府职能转变的长波进程.....	105
三、本土社会转型历程：政府职能转变的特殊脉动.....	106
第二节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时空特征.....	109
一、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独特场域：地方.....	109
二、空间地方性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110
三、时间地方性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112
第三节 农村社会治理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选择.....	114
一、执政观念的转变.....	116
二、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	117
三、政府治理手段的更新.....	118
第四节 一个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实例：杭州“复合创业”实践.....	119
一、“复合创业”主体及其特征.....	119
二、“复合创业”的实践探索.....	121
三、“复合创业”实践中地方治理特色.....	124
第六章 非正式制度与农村社会治理.....	127
第一节 非正式制度及其特点.....	127
一、非正式制度的涵义.....	128
二、非正式制度研究的主要视角.....	130
三、非正式制度的嵌入性和地方性.....	132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	136
一、非正式制度与采借性制度的制度绩效.....	137
二、非正式制度与原生性制度的制度绩效.....	138
三、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	139
第三节 非正式制度与农村社会治理.....	142
一、农村社会治理中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	143
二、非正式制度与地方社会治理.....	145
第七章 农村社会治理的政策选择.....	150
第一节 经济发展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	150
一、坚持农业现代化之路.....	150
二、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153
三、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55
第二节 良好生态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保障.....	157
一、坚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157
二、依靠制度和法治保障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159
三、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新格局.....	161
第三节 新型农民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	164
一、培育新型农民.....	164
二、开展农村职业教育.....	167
二、营造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氛围.....	169
参考文献.....	171
后 记.....	181

第一章 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二元结构

经济生产活动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①，构成了农户家庭经济结构中“入”的方面；家庭经济消费是农户家庭经济支出的主要内容，构成了农户家庭经济结构中“出”的方面，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只有把“入”和“出”结合起来，关注其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才能获得全面的理解。国内已有的农村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对西部农村的研究相对薄弱。西部地区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水平都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与东部、中部地区也有很大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对已经形成的农户经济理论形成了挑战。本章通过西北地区农户家庭生产消费实践的考察，展现西部农村地区农户经济生产和消费的特点和逻辑。

第一节 农户经济生产的二元结构

农户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一个经济组织。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村经济组织地位重新得以确立。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农户家庭根据其对生产和消费需求采取相应的经济活动。这一过程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现代化、信息化和农村市场化进程而发生着深刻的

^① 本部分内容主要是作者根据博士论文浓缩、精简其主要思想形成的，表达了作者关于西北农村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看法，本书也以此作为论证的起点，原文约18万字。参见饶旭鹏. 国家、市场与农户经济行为——以西北乔村为例[D].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7.

变化,并最终形成一种“工农结合”的二元生产格局。

一、土地地位的改变

格尔茨在研究东南亚农业时把受资本、技术和土地面积约束,农业无法向外扩展,致使新增劳动力不断填充到农业生产中,“使耕作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以此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增长的劳动力,同时又不致于造成人均收入下降”^①的“自我战胜过程”称为“农业的内卷化”。后来,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传统小农时对“内卷化”概念进行了引申和发挥,在《华北小农》里,他把内卷化理解为由于人口增加造成单位面积上劳动投入的增加,从而形成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②在《长江小农》里,则理解为“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单位劳动日报酬降低”式的“内卷型增长”^③。格尔茨和黄宗智讨论内卷化时,其研究的重点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在他们看来,农业社会的土地是一种刚性约束,无法突破,只有通过精细化和内部填充的方式来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自然条件艰苦。特别是远离城市和城镇的山区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糊口经济。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户家庭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艰苦的自然条件和土地的低产出使由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变迁所释放的生产力迅速释放完毕,农户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温饱水平上陷入停滞。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人口的增长使人地矛盾逐渐凸现出来,在劳动力外出不足和农业技术革新受限的情况下,农户家庭通过两种方式化解了人口增长可能造成的过密化发展:一是大量开垦荒地,拓展耕地面积;二是通过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使新增人口顺利实现就业,并创造出了新的劳动价值。

这样一来,至少在西北农村地区,新增劳动力并没有成为向农业内部填充的对象,而是成为农户家庭土地面积扩张和畜牧业发展的新的推动力量。黄宗智立论的基础是家庭农场(农户)不像经营性农场那样可以根据农场规模和生产经营状况解雇或雇佣劳动力,家庭农场没有这种劳动力数量调节优势,这是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填充和边际收益递减的根本原因。西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即使

①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80.

② [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6-7.

③ [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77.

这个基本假设的普适性受到限制，增加的人口通过扩张耕地面积顺利实现就业，而且还发展起劳动收益率较高的放养畜牧业，所以没有造成劳动力边际收益的下降。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土地的弹性机制，即其土地面积在遭遇人口增长压力时的自我扩张，这一扩张过程还进一步利用了新增的劳动力优势，促进了放养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在西北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其土地约束的弹性机制，使得无论什么意义上的农业内卷化都没有真正发生过。人口的增加反而提升了农户家庭生产选择的空间和家庭整体收益水平，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战胜过程”。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城乡二元户口制度的松动，出现了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民工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逐年递增，大量人口进城务工的直接后果使在传统农业社会占突出地位的土地问题不再成为问题，甚至出现农村土地无人耕种的土地撂荒现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农户家庭纷纷减少农作物播种面积而外出务工。为什么西北农村地区具备农业规模化经营条件的村庄不但没有出现大量的土地流转，走农业规模化经营之路，而是纷纷减少土地种植面积外出务工呢？这大体上可以从劳动力和土地两个层面来获得解释。关于劳动力的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此处先讨论土地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关系。

第一，农户不愿放弃土地是基于家庭经济生活安全保障的考虑。虽然土地对农户家庭经济生产的重要性下降了，但在目前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土地仍然是农村居民生存的基本依靠，也是居民在当地获得身份认同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国各地的社会政策环境下，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重要问题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限制和不公正待遇，这使农民工的城市化融入之路变得艰难。在这种条件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谁也不愿放弃自家耕地，以备不测，土地由“基本生产资料”转变成“底限生产资料”。在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历史时期，土地是“必备生产资料”，如果没有土地或土地面积过小，都会引发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尖锐矛盾；但当外出务工成为家庭主要现金收入来源时，土地就成为农民外出务工的“社会保障”，保留一份土地，就等于买了一份“意外保险”，农户家庭的生活就有起码的保障，不致于在外务工出现危机时无家可归。这样，土地就成了一份“零风险资产”和“底限生产资料”，不但没有任何风险，而且只要保证没有荒芜，每年还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粮食补

贴，也有资格享受其他农业补贴。

第二，农户家庭留守人员不愿走农业规模化经营之路是基于其家庭经济利益的考虑。如果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核算方法来计算，农户种植小麦、油料的经济生产行为只能是负收益。这种低产出的农业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保障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却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发展需求。因此，即使不外出务工的留守农户，其留守目的也不是通过农业种植或土地规模化经营实现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至少在西北地区普通山区农村的农业生产条件下，规模化经营风险大，收益小。可以看出，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在西北农村地区并未达到农业生产规模化、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农村发展水平的预期效果。西北地区山区村庄的贫困不是因为农户“不经济”的经济行为方式，也不是土地的碎片化造成的土地规模化经营困境。甚至可以说，西北农村的贫困与土地制度无关，而是与土地质量有关。正如恰亚诺夫所认为的，农户在家庭需求满足程度和它所耗费的劳动辛苦程度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其劳动力的“自我开发程度”。乔村的经济行为逻辑则是，在相同的劳动力“自我开发程度”下，在耕种土地和非农就业之间从事哪种经济活动能够实现家庭需求满足就选择哪种，显然后者更能满足家庭的需求。特别是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希望通过外出务工实现向上流动，融入城市生活，这更加速了其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积极性。由此看来，在以种植业为主、地广人稀的贫困山区，土地流转制度并不能解决农村的发展和农民致富问题，农户的非农就业是土地政策自身所无法容纳的农户家庭经济成长方式。农户家庭对土地利用程度的降低和非农就业的增加只能从中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进程中去寻求解释。

二、劳动力的非农化配置

人口学上有一个解释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诸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西部地区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变化就可以用这种推拉作用来解释。

从拉力角度来看，在农户家庭经济生产中，作为传统农业生产的“命根子”

的土地降格为“底限生产资料”，成为保障农户家庭经济生活的“底限”和基础。相应地，家庭主要劳动力就不可能再配置到农业生产上，而是出现了非农化转移。这种转移首先是从“不离土，不离乡”的外出务工形式开始，主要在家乡附近打短工；后来逐渐发展为“离土不离乡”的务工形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再加上国家户籍政策放宽，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于是开始出现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现象，逐渐从“离土不离乡”发展为“离土又离乡”，开始出现全国性的“民工潮”。农户家庭外出务工也从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发展为举家外出务工，不论是规模、程度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业劳动力配置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结构的变化。

从推力角度来看，西北地区土地产出率低下，无法满足农户家庭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在远离中心城市和城镇的农村地区，低产出的土地无法满足农户家庭经济消费的强烈需求。^①无论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农户，还是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的农户，都必须顺应市场潮流在劳动力配置上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最初是发展种养结合的家庭农牧业，在政府政策引导、财政补贴与技术支持下，通过改善农业种植品种、种草种树、圈养养殖等形式，发展出以农业种植业为基础、种养结合的多元经济格局；后来，在农业收入持续偏低情况下，逐渐发展为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举家外出务工。

推拉作用最主要地表现在伴随着改革开放引起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城镇居民，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波浪式扩大的态势。1978—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下同）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其间经历了“两降、两升”的过程，其中，1984年为近36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最低点，收入比为1.84：1；2009年收入差距达到最大，收入比为3.33：1。从2010年起，城乡收入比出现连续4年缩小的趋势，到2014年为2.92：1。虽然城乡收入比在缩小，但收入差距的绝对额仍在扩大，自2008年突破1万元后，到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8万元^②。

① 关于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将在第二节中进行论述。

② 曹四光，张启良.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新视角[J]. 调研世界，2015(5):9-1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在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长期以来,我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使得大部分投资、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先进技术被吸附到工业领域,进而影响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李强根据调查结果列出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部分推拉因素及其位次(见表1-1),在诸多推拉因素中,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农村收入低、没有挣钱机会等是主要因素。

表 1-1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推拉因素

影响转移的因素	推力或拉力		选择的百分比(%)		排列位次	
	2002 年	2000 年	2002 年	2000 年	2002 年	2000 年
城市收入高	拉力	拉力	54.8	57.5	1	4
外出见世面	拉力	拉力	52.1	58.5	2	3
农村收入低,没有挣钱机会	推力	推力	48.5	62.4	3	1
农村太穷,生活太苦	推力	推力	43.9	54.9	4	5
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	推力	推力	38.7	62.3	5	2
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	拉力	拉力	34.1	35.4	6	7
对在家乡从事的事业不满意	推力	推力	27.5	37.2	7	6
农村税费过重	推力	推力	27.2	26.6	8	9
待在家里没事干	推力	——	25.3	——	9	——
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	推力	推力	24.6	21.3	10	10
不愿意干农活	推力	——	23.1	——	11	——
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	推力	推力	18.4	34.3	12	8
村干部作风恶劣	推力	推力	14.8	16.1	13	11
想外出生孩子	拉力	拉力	2.0	0.4	14	14
和领导关系不好	——	推力	——	2.0	——	13
当地人际关系复杂、难处	——	推力	——	5.9	——	12

资料来源:李强.农民工与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3-44.

这种“推拉”的后果是农户家庭把家庭主要劳动力配置到城市工商业部门,出现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民工潮”现象。表1-2是2010-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规模,可以看出,农民工逐年增加,到2014年已经突破2.7亿人。

表 1-2 2010-2014 年全国农民工规模

单位: 万人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农民工总量	24223	25278	26261	26894	27395
1. 外出农民工	15335	15863	16336	16610	16821
(1) 住户中外出农民工	12264	12584	12961	13085	13243
(2) 举家外出农民工	3071	3279	3375	3525	3578
2. 本地农民工	8888	9415	9925	10284	10574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14 年全国农民工检测报告[D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2015-11-4.

表 1-3 是 2014 年外出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构成, 可以看出, 农民工输出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点。按输出地分, 东部地区农民工 10664 万人, 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 38.9%; 中部地区农民工 9446 万人, 占农民工总量的 34.5%; 西部地区农民工 7285 万人, 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 26.6%。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中部地区高出 0.5 和 1.3 个百分点。^①

表 1-3 2014 年外出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构成

按输出地分	外出农民工总量 (万人)			构成 (%)		
	外出农民工	跨省流动	省内流动	外出农民工	跨省流动	省内流动
合计	16821	7867	8954	100.0	46.8	53.2
东部地区	5001	916	4085	100.0	18.3	81.7
中部地区	6467	4064	2403	100.0	62.8	37.2
西部地区	5353	2887	2466	100.0	53.9	46.1

资料来源: 同表 1-2。

总的来看, 东部地区农民工总人数多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这与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有关,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西部地区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跨省流动的比例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而东部地区省内流动的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这表明农民

^① 国家统计局. 2014 年全国农民工检测报告[D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www.stats.gov.cn>

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高收入。

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土地地位的转变，促使其生产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业种植业生产变成满足农户家庭留守人员口粮和生活必需的保障型农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变了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家庭现金收入来源则主要是外出务工收入。同时，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造成了农业生产规模的缩小和农业种植业的粗放化趋势，农作物生长期的除草、追肥、田间管理日益减少，对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生产性投入也趋于减少，牲畜和羊只的减少更是缩减了农家肥的使用数量。

三、农业技术革新动力不足

赵冈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与土地》中，继承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基本前提，以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与人口变化数据为基础，提出了“人口压力模型”，认为中国下降的人口——土地比率导致了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使得技术革新无利可图。这种解释在人地矛盾比较突出地区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然而在西北地区山区农村，其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并不突出，人口的增加也没有造成劳动生产率的明显下降，而是激发了农户家庭扩展土地面积和发展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放养畜牧业的积极性。

对中国农业发展技术革新动力不足的另一种解释则着重从阶级关系和社会剩余财富的分配角度寻找原因，这种视角被称为“剩余榨取框架”。与赵冈不同，利佩特认为传统中国的农业经济有相当多的剩余，并且社会精英阶层有效地从小农及工匠手中榨取了这部分剩余。这部分剩余本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投资基金，但却被精英分子这个食利阶层消费了，因此造成了农业科技革新停滞不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农业发展中，的确出现了类似于“剩余榨取”的“农业哺育工业”过程。为了支持薄弱的工业体系迅速发展，国家通过“剪刀差”的形式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据温铁军推算，1953-1978年间，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总额在6000-8000亿元之间^①。改革开放以来，工农业的剪刀差虽然逐渐减少，但农业仍然为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这种状况至今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利佩特的“剩余榨取”模型对精英阶层不愿投资农业生产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失误，濮德培和黄宗智通过研究均指出过这一点，而且，利佩特对精英的分析也不具体。

^① 参见温铁军.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77.

对于贫困地区农村农业技术革新动力不足的解释不能从国家或农户任何单一维度去理解，而是必须考虑农户与国家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

就农户自身来看，在西北地区农村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体系中，耕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都不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其人均耕地面积较大且具有可扩张性，人地矛盾并不突出。农户家庭发展起来的农牧结合的农业生产方式可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但无法满足家庭成员发展需要，婚丧嫁娶、房屋改造、子女上学、医药费用等大额现金需求压力成为农户外出务工的基本动力。上文中李强调查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见表1）。那么，为什么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农户家庭不选择对农业生产系统进行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选择外出务工呢？这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第一，农业生产的低产出使农户家庭不认为通过技术革新能够提高土地产出率以改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第二，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剩余量非常有限，使单个农户根本无法完成技术革新。

就国家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农业哺育工业的政策，这就使得农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各种方式被提取并集中起来以支持城市工业发展。但是，也不可完全否认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和投入。就整体情况来看，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个村民小组都拥有1-2台手扶拖拉机，还拥有集体农场、仓库。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成为农业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土地的细碎化和农业生产的小型化限制了其经济规模，也限制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支持非常有限，集体化时期那样的农业投资在改革开放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经济现代化进程。这种限制和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体系一起迫使农户家庭对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并最终走向外出务工的非农化就业之路。

在当前历史背景下，由于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普惠化”使农户家庭不可能通过农业技术革新而发展农业生产。收入结构变化和家庭经济收入重心的转移使农业生产成为农户家庭的“保障性”产业，使其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动力不足。

四、农户家庭二元生产格局的形成

农户经济生产行为研究必须把握农户家庭与经营式农场或其他任何企业的本